

Tianyeyzhongde MinzuShehui Yu Wenhua

田野中的 民族社会与文化

看本加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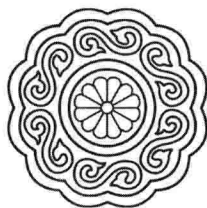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度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社会学专业建设项目资助

田野中的 民族社会与文化

看本加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野中的民族社会与文化 / 看本加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161 - 6056 - 5

I. ①田… II. ①看… III. ①民族学—文集 IV. ①C9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484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丁 云
责任校对 李宾宾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12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族群认同与民族关系

民族认同的历史反思

——羌民族认同缺失的自观分析 刘 超(3)

迁移背景下族群关系变迁的研究

——基于光明村吊庄移民的研究 杨俊峰(15)

人类学与民间信仰

甘肃舟曲地区“婆婆”信仰的人类学研究 姚梦元(37)

汉族丧葬仪式的功能及其变迁

——以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水沟河村为例 巩二龙(50)

招财猫的民间信仰初探 王婷婷(62)

文化变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兰州市朱家沟村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摆永明 等(73)

苗族水鼓舞文化研究

——以剑河县大稿午村为例 杨文东(137)

其 他

浅析《小红帽》故事中的行动圈与角色的功能 李修贤(165)

田野随笔

羌乡田野杂记

——重拾于一个边缘羌村的本土历史记忆 刘 超 (173)

编后记 (195)

族群认同与民族关系

民族认同的历史反思

——羌族认同缺失的自观分析

刘 超

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中，中国学术界以斯大林的经典民族定义为范式指导，将民族看作人们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历史实体，探求共同族源对民族认同建构的重大理论指导意义，成为现实民族认同的践行标准。本文于当下时代背景中，结合羌族民族认同缺失的现实问题，深刻认识到溯源认同的弊端所在，采用自观分析研究方法，浅析传统史学观中历史共同体的民族溯源认同在面对当代新的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困境，试尝寻求适应新时代形式的新型民族认同观。

关键词：历史事实；现实情景；地域文化；羌族认同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正向着 21 世纪 20 年代迈进，我们的社会面临着全球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双向发展，全球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趋同性与多元性并存。在新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我们今天生活过的每一刻都将成为明天的过去，那些曾经生活过的生活即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文化在发展变迁，民族认同观即随之改变。根据斯大林的经典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 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把民族看作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稳定的共同实体，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也是基于共同历史背景之下的历史认

①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3 页。

同，共同历史起源已然成为各民族认同的符号和情感纽带。如今，在学界和政府以及民间团体，纷纷将民族认同的历史因素奉为主臬，更有甚者盲目攀附历史，夸大本民族历史，将某些历史看作民族认同的决定因素，以此建构共同历史的民族认同。

羌族被费孝通称为“输血”的民族，发展壮大别的民族，自己却没落于历史长河之中。羌族历史既是一部民族壮歌，又是一部悲情史。有华夏始祖炎帝之血脉相承，又有治水英雄大禹生于西羌之史略；有无戈爱剑之后种姓凡百，又有李元昊之西夏同于河西。从史学大家顾颉刚的《古史辨》到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格局，再到当下的藏彝走廊，无不体现古羌在中华历史的杰出贡献。当今羌族与古羌人所具某种族源延续的史学论证，使得古羌历史溯源成为当今羌族民族认同的根基。在现实社会新形势下，以古羌历史作为当今羌族民族认同的根基，溯源认同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已经陷入无根之源。尤其表现在真羌与假羌之主观偏见，历史根基的优越感与自卑感之分歧，当代羌族青年遗忘根基性情感联系和只知户口上是羌族的现实之抉择。

一 族源的模糊性

民族认同研究从根本上是要解答社会群体成员自我归属问题，涉及了诸如“我是谁”、“我为什么是我”以及“我从何而来”的问题，是群体成员自我认同的主观心理归属。

略知羌族历史便知道，羌是一古老的民族^①，有着三千年以上的历史，最早曾记载于商代甲骨文之中，被费孝通称为“一个输血的民族”，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如今族人也以本民族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卓越的历史功绩而自豪。

继而如此，容我们对羌族的族源认同稍加深入探讨，便会发现诸多值得深思之处。

于此我们不得不谈到从炎帝到大禹再到姜姓部落，谁才是羌族族源认同的核心？

^① 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的古代“羌人”应为华夏民族以外牧羊之人的泛称，而有别于当今之民族概念，鉴于习惯此文将“古羌人”称作民族而不作具体区别。

关于古羌人与炎帝、大禹、姜姓之渊源的史料纷繁而杂。首先见于《帝王本纪》：“黄帝以姬水成，故为姬姓，炎帝以姜水成，故为姜姓”、“炎帝，神农氏，姜姓也……”、“炎帝神农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又见于《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① 此处记载古羌人源于姜姓，而姜姓出于上古炎帝部落联盟，由于姜姓炎帝部落联盟在与姬姓黄帝部落联盟争夺资源竞争战争失败后，部分姜姓部落西迁至甘青地区，逐步发展为“西戎牧羊人”为主要标志的羌人，炎帝或姜姓成为追溯羌族族源的最早英雄祖先历史记忆。另外，晋人转引《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蜀王本纪》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又见《史记·六国年表序》云：“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新语·术谱》说：“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② 此类文献印证了民间关于禹生石纽等事迹的真实性，加之民间传说、禹迹，巩固了大禹在羌族记忆中英雄祖先的地位。现在北川、汶川一带羌民都以大禹为古老祖源的象征，而以“大禹子孙”为民族情感的根源，大禹成为羌族认同的精神支柱，将大禹看作本民族的祖先起源。

问题便在于此，暂且搁置学术界对上古时代“三皇五帝”真实性的争议，就此处的炎帝、神农、姜、禹等英雄祖先的争议，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羌源呢？究竟羌出于姜还是姜出于羌？谁才能够成为这一民族成员共同的英雄祖先？整体的共同的英雄祖先人物及其历史记忆认同的缺失便导致民族成员间共同族源认同的根基情感联系的缺失，从而致该民族整体认同凝聚核心的缺失。民族成员间就像一把沙子一样，看似能抓在一起，却没有统一的核心作为凝聚力量。

我们曾说“古羌人”是为广泛地域下的地域族群概念而非当今民族概念人群，但从涉及古羌历史文献中界定，古羌连一地域族群概念都无法解释其族群本质，只能作“一群人”来界定——生活在华夏西部的异族人群。“羌”自古以来就不是某民族的自称，是华夏民族对生活在华夏西部的异族的他称，具体地说就是在古代（这里可追溯至商周时期）是没有确切地被称为“羌”的具体人群，随着华夏核心的不断扩大，华夏边

① 耿少将：《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26页。

缘也随着西移，边缘外的“异族”概念也随之西移，曾为“异族”的部落人群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或被进入华夏族群认同范畴。作为“西戎牧羊人”的“羌”这一“异族”地域范围也随着华夏的扩张而飘忽不定，没有固定的人群可作为羌族的族源群体，最多可解释为若干部落群体的广泛“人群”概念。这便是“古羌人”地域范围的模糊性，也就是“古羌人”族源的模糊性。

然而当代羌族的族源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现在的羌族是由模糊的“古羌”人群的若干支群融合而成，其主要包括土著羌部落“戈基人”——秦汉时期开始活跃在岷江流域的“冉龙羌”部落（现在我们自称尔玛的另译）；汉景帝时翻越巴颜喀拉山迁入岷江流域的“三姐羌”部落（羌族莎朗唱词俄啰三基是历史记忆的标记）；隋唐时代活动频繁的“白狗羌”（释比经典唱词的阿巴白构是为这一部落英雄祖先历史记忆）；及三国时期迁入的胡虏民族。一般认为主要以“冉龙羌”部落和“白狗羌”^①部落为主体。各部落在不同时期进入岷江流域定居，各种资源竞争愈演愈烈，各自为伍，没有统一的族源，正如有学者形容“无法定义羌族”^②。

分析这些文史材料来看，从炎帝、神农、姜姓、大禹等始祖记忆的争论，到多元融而未合的古羌人族源典范史，于今之羌族族源研究，学术界大多将“古羌之后”作为典范史，被奉为圭臬。而好些本土羌学者以及民族知识分子更是极力将今之羌族与“古羌人”混为一谈，无论哪一项考古发现，史志记载，甚至其他民族文化事项，都能与自己的“古羌人”族源相攀附。当然历史既是过去，今天由昨天之历史塑造，今天又在建构明天之历史，我们不得对历史视而不见。而如此过多的夸耀，攀扯，牵强附会与“古羌人”的族源关系，认为当今羌族完全是“古羌人”之历史实体的延续，将难免会陷入无根之源的困境。历史的过去谁也说不清，过多地去讨论关于历史的来源或真实性，最终将陷入历史长河的无根之困境，只能自圆其说。

被民族内化的成员以建构共同的祖源记忆来凝聚，共同的族源往往是

① 耿少将：《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②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2页。

凝聚民族认同的根基情感因素。然而羌族这种共同族源的模糊性，在自我民族认同上便缺少根基性的情感联系，从族民性的根基中就造成认同的缺失，无法形成族民统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如当地老人常讲的：根根都不一样，咋个一样嘛！对于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关怀，更多的则是注重对于人的现实关注。我们既知当今羌族整体民族认同的缺失，便是由其历史族源的模糊性，共同祖源记忆的争论中造就而成。而今之学术界却过多地作族源追溯，将千疮百孔的羌族史作为人类典范史，以及大多羌族知识分子过多地信奉这种模糊的“古羌”族源说，加速了人们对自我来源，现实身份归属的迷茫以及民族成员身份的缺失。

二 不稳定的秩序体系

在民族认同建构中，稳定共同的秩序体系是认同建构的催化剂，是群体成员共同凝聚的政治权力。在“羌人”中，从地缘实体到政策软实力都展现出一种不稳定的模糊的秩序体系整合之中。

1. 模糊的地缘秩序

范晔的《后汉书·西羌传》记：“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进而将西方各族都收进去，统称为“西羌”，而其所述不立君臣更是没有稳定的地缘秩序体系下模糊的地缘认同。^①

由此可见当时华夏对西部异族的定义为：相对于华夏的规律与秩序，羌人的异族本质在于他们的“不规律性”，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统一的氏族体系。这虽然是华夏对羌人的主观看法，但却反映出羌人诸多不稳定的秩序体系，从羌人没有整体的地域文化到不立君臣的政治秩序，都印证了羌人无整体认同体系的族民性。

2. “不立君臣”的政治秩序

从甲骨文记载“羌”以来，就没有关于其建立统一政权的记载，只为华夏对西部异己的泛称，最多记载到羌人在战时的“打狗结盟”^②，一旦战

^①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0页。

^② 黎光明、王元辉著：《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王明珂整理、导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期刊之一，第9页。

事结束，这种临时的结盟状态自然解散，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党项羌建立的西夏王朝是一例外。但西夏仅为党项羌一支，没有形成凝聚所有羌人的核心政权，而且历史短暂，西夏灭亡后党项羌人逐渐被同化为其他民族，与现在羌族无任何族源联系可寻。藏族先民有其围绕赞普建立的统一的吐蕃政权，蒙古族有其围绕可汗建立的统一的中央政权并最终统一中国，蒙藏都有围绕英雄祖先历史记忆^①下构建起来的稳定的“国家”^②认同意识。统一的政权建立对民族成员有着强大的向心力，吸引着成员自觉的认同倾向，统一政权牢牢地控制着民族成员的政治权利，更是民族成员认同构建的向心力。“羌人”有史以来就没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致使无法找到统一的核心认同力量来凝聚民族意识。“羌人”在介于游牧与农耕之间的二元经济体系下，没有受辖于“君王”，因此汉人对“羌人”的侵夺便肆无忌惮，而“羌人”的“无君”状态也经常呈现无“我族”的意识。

由此诸多不稳定的秩序体系产生了“羌人”及羌族这种无法建构其核心民族认同的族民性。

三 宗教信仰的弱化

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作杜尔凯姆）看来，宗教仪式的功能就是强化一种价值和行为方式，如限制个人利益为社会牺牲等。他将宗教功能分为两个层次，并进一步指出宗教的功能可归为两种：第一，宗教是集体情感与观念的沟通关系；第二，宗教是规范社会关系的手段，如增加社会规范的权威，使人们产生向心力，加强团结。^③宗教在集体情感与观念的沟通关系中增加人们的向心力，同时也无意识地增强了人们的认同力。而这种通过宗教构建起来的认同意识牢牢地根植于人们心中，可作为民族认同的根基性情感联系，即构建起来的以宗教人物作为假想的英雄人物，从而构建起民族的认同意识。在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其中

① 关于蒙藏的英雄祖先历史记忆分别可简单地用大家熟知的人物，如成吉思汗、松赞干布的故事作简单解释，而羌族的“历史记忆”中没有这样的英雄人物。

② 此处“国家”主要指在古代由边疆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在中原王朝“天下”概念中所臣服的地方属国。

③ 参见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正如穆斯林民族的例子。

在我国共有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这些民族从族源形成到分布地域，从体质特征到文化事项，横向纵向比较都存在较大差异。然而这些伊斯兰民族同胞，见面时相互握手并致以问候“色俩目”，平日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除了思想上的六大信仰外，还确立了一系列宗教功课和礼仪，^①达到思想信仰和行动上的统一。纯正的宗教信仰作为伊斯兰民族同胞间相互认同凝聚的力量，所有伊斯兰同胞就是一整体，不分历史、肤色、语言的差异，穆斯林同胞就是自己的亲人。而他们相互认同的共同核心便是至高无上的真主，真主是唯一的神，阿拉是假想出来的英雄祖先历史记忆，作为凝聚民族意识的根基情感联系，进而区分“我族”与“他群”，其认同边界就在是否认同真主，真主是凝聚穆斯林民族情感的最高核心。无论是平常见面一句平和的问候还是严格的日常行为规范，以及那至高无上的真主崇拜，都是在伊斯兰教的各种教义规范之下，通过宗教整合社会、规范成员、凝聚成员的民族认同。

回到羌族的例子：羌族信仰白石崇拜，以羊为图腾。属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对自然的恐惧和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的客观唯心思想，这种原始宗教既不能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也不能作为凝聚人群的根基情感联系。羌族的原始宗教观符合弗雷泽的“巫术—宗教—科学”理论。弗雷泽认为：有灵观不仅不是原始文化的唯一信仰，而且也未占有优势地位，原始初民最早企图通过符咒仪式达到控制风雨雪电等自然力量，然而，在漫长的时间演进中，他们发现巫术力量不能偿其所愿，于是才产生了戒惧或希望的心理，企图借助某种非凡能力、魔鬼、祖灵或神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白石崇拜或羊图腾是对自然灵物的崇拜。羌族社会重要的宗教人物——释比，其所具有的诸如嘿山大法、上刀山、舔铧铁等特异技能，正是弗雷泽关于巫术的经典定义：人们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宗教的最低级阶段。

在羌族宗教社会中，围绕释比建立起的巫术信仰体系尚不具备宗教信仰体系那样规范群体、凝聚成员的功能。因而缺少被神化祖先的灵性，以

① 杨圣敏：《中国民族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② [英] 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原始巫术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不能充当构建认同核心的象征体，作用的物只能作为人欲的工具。然而近代佛教、基督教的传入使得原始宗教的影响力降低，原本就不够稳定的白石崇拜日渐弱化，更在思想上弱化了对认同意识和观念的形成。对外来宗教无法完全接受，而自己的确又几近丢失，最终落得不伦不类。

英雄祖先的缺失，宗教信仰的弱化，使得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减弱，致使羌族的民族凝聚力减弱。民族认同核心的缺失，没有明显的民族认同核心，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我族观念。

四 历史行政区划,分而治之的区域分化

整体性地域条件下产生整体性文化并建构整体民族认同观，但在整体地域上利用强制手段插入政治力量，使用政治权力将整体文化区域分化成非整体人群居住区域，长期各种变迁机制下难免导致整体文化的分化以及整体认同的弱化。在中国历史上不少见诸如此类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边疆问题，化异族为我群以重新界定华夏边缘的现象。

中国历代统治者以“天下”作为自己统治势力范围，既包括对中原农耕文明的绝对统治，也包括对游牧文明的羁縻制度。然而历代最让统治者焦虑的政治问题便是西部、北部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资源竞争日益激烈，最终演化为两大文明之间不断的冲突，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史例比比皆是。历代王朝采取了诸多不同缓解游牧与农耕激烈资源竞争的手段，或以和亲来缓解暂时的动荡，或以怀柔的羁縻制度对其册封赐地，或以强烈的军事对其打压驱逐隔离，或进行直接的行政统治来分而治之的行政割裂手段对其加以分化。

自商代甲骨文记载以来，各种古史文献均有关于羌人的记载，例如：《说文·羊部》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又见《太平御览·风俗通》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因以为号。”^① 因此，学界者将古羌人纳入游牧文明下的“羌人集团”，从事游牧的

①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载《社会科学战线：历史学》1980年第1期，第117—152页。

经济形态决定了“羌人集团”游牧文明的文化形态。任乃强先生认为：

羌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为人所知，古代羌族在生产方面的最大成就，便是驯养野兽成为家畜，他们驯养的羊、牛、马成功之早，远远超出世界其他民族。^①

作为游牧文明下的“羌人集团”正如其他游牧集团一样，历史上曾数次与中原农耕文明发生冲突，在冲突中败下阵来而被农耕民族或加以驱逐隔离，或加以政治统治而达到文化的同化，以分而治之的行政割裂手段加以分化。自秦汉以来，羌人曾多次与中原地区发生冲突，最终被迫数次向西部、南部、西南等地区迁徙。汉武帝对羌人地区进行“开河西”，置“酒泉四郡”，封“属国都尉”、“护羌校尉”等地方官职。王莽又在今青海地区置“西海郡”^②，从此西汉政府用武力将羌人割据为若干的孤立单元。除了以武力进行威慑外，对“羌人”多施之以离间、分化的手段，促使“羌人”分化为南北两部，中间被汉行政地域分割，两部文化交流中断逐渐出现很大的差异。北部“羌人”逐渐被融合为其他民族或一部分迁至今新疆一带，南部“羌人”大多成为当今藏缅语族各民族的族源。这些被武力或被自然地域条件分割成不同单元的羌人部落，从此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逐渐融入或“被进入”演化为其他民族，只有南迁至岷江流域的部分羌人在与当地土著羌人部落融合，适应当地地域环境下，作为汉藏边缘政治缓冲地带而得以保存。此行政割裂手段达到了汉王朝安定边疆分而治之的目的，致使“羌人”从此走向衰落，民族意识逐渐被同化。

历史记忆如此，当前社会事实中也出现此类情境。北川羌族自治县是2003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地区处于与汉族最接近的地域空间地带，文化事项中汉化最严重，羌民族认同最弱化的地区。然而追溯北川历史，也曾出现西汉时期出现过的分而治之的行政区域分化手段。汉代北川属于蜀地汶川郡广柔县，北周置北川县，唐太宗设石泉县。公元11世纪，北川地区成为汉与非汉共处的华夏边缘交界地带，

① 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

② 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北宋政府将北川划归绵州（今绵阳市），将之纳入汉人编户的行政管理中。^① 此举暗示当时北川地区已成为汉番（羌）共居之地。北川汉化已相当普遍，汉化也就意味着北川地区“羌人”自我民族认同大量丢失的开始，人们假构出诸多与华夏相关的祖先历史起源，很多人认为祖上来自湖北麻城孝感等地。在中央政权对羌区进行行政划分割裂、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下，最终促使北川羌民严重地汉化，丢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弱化了自我族群认同，多以汉人自称。

民族边界的变迁致使民族认同的变迁，北川由番（羌）区化为汉区是民族认同丢失最直接的原因。

五 摇摆的认同抉择

处于汉藏两大文化群体之间的夹缝之中的羌族，从其外在的文化事项到内在的民族内心情感都呈现出汉藏之间的过渡地带，尤其在民族认同中体现出摇摆的认同抉择。笔者在多次进行羌族民族认同研究调查中，了解到移民是影响当地民族认同呈现摇摆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进一步分析移民因素时，一个富有地域文化色彩的民俗语言词汇“插占为业”，引起笔者的关注。

在访谈调查中，很多老人讲到自己家族史时都会提到一重要词汇：“插占为业”，而在讲述“插占为业”的祖源记忆中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摇摆状态。例如湔江流域支流白草河片区的老人都会谈到自家祖辈于湖北麻城孝感来到此地“插占为业”，如下为白草河流域一肖姓老人的讲述：

我们祖祖（四川方言，即祖父）大概在清朝时候，湖广填四川时期来到这个山沟沟里头，以前本地区没有人住，老祖宗从外面搬进来就开始占地盘，来得早的就选好的地方占，占得多，以插旗为界，作为自己家业。来得晚的就占得少，占不好的地方，最后来的就没有地盘可占，在别人手里租地为生。

老人讲述祖上“插占为业”的历史记忆时，特别强调自己祖上是汉

① 耿少将：《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6页。